

“庙会”界说

小田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历史系, 江苏 苏州 215009)

[关键词] 庙会; 祠庙; 民俗文化; 中国古代社会史

[摘要] 庙会是以祠庙为依托, 在特定时间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庙会的本质属性通过一系列征象表现出来, 而与其他“会”的组织相区别。这些征象是: 空间的结节性; 主体的广泛性; 内容的复合性。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0)03-0103-07

Definition of Temple Fair

XIAO-T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zhou Railway Teacher College, Suzhou 215009, China)

Key Words: temple fair; temple; folklore; a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forms of many temple fairs, a temple fair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assembly of country folks centered around a temple. During the fair, people hold religious ceremonies, do business and have recreations. Temple fair's characteristic is reflected through a series of signs: nodus of space, the universality of participator, complication of activ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assembly.

祠庙是传统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物质文化景观, 以祠庙为依托而形成的庙会, 是透析社会实态运作的重要视点, 近年来引起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日益关注。但是, 历史上名之曰“会”的组织实在繁杂。^①有庙未必有“会”, 是“会”未必是庙会, 甚至有冠以“赛会”、“神会”之名而无庙会之实者。庙会本身的复杂性, 造成论者对其理解的困难; 在论者之间, 歧异在所难免, 舛误亦复不少。本文的申说, 是检讨诸家庙会概念之后, 在对相当时空的庙会型态进行考察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家之言。

“庙会”概念的检视

早在1925年, 顾颉刚先生调查北京城西妙峰山庙会时, 称这里的庙会为“香会”。他说, 香会是乡民祀神的会集的变相; 从前叫做“社会”, 自从释道庙观并起, 固定的社会就演化为流动的社会; 流动的社会有两种: 一种是

从庙中异神出巡的赛会, 一种是结合了许多同地同业的人们齐到庙中进香的香会。^②我们注意到, 民俗学家最初接触庙会现象时, 就已经从历史源流的角度, 涉及到了庙会的基本内涵和类型, 然而奇怪的是, 后来的研究者并没有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全汉升先生在考察中国庙市历史时, 虽然也注意到了庙市中的娱乐活动, 但在他那里, “庙会”也就是庙市的意思, 二者并没有分别的地方。^③自此

① 在民国时期的浙江乡村社会, 称之为“会”的社会组织, 关于经济方面的, 有七星会、摇会、新安会、蓬头会、桑苗会; 关于公益方面的, 有种植会、禁会、道路会、水利会、桥会、渡船会、水龙会、施材会; 关于娱乐方面的, 有迎灯会、戏文会、长生会、土地会、三官会; 关于迷信方面的, 有赛会、神会等等。见蔡斌威:《中国农村社会固有组织的分析及其价值》,《文化建设月刊》第二卷, 第六期, 1936年3月10日出版。

② 顾颉刚:《妙峰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影印本, 第13页。

③ 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第一卷第二期, 1934年12月16日。

以后,把“庙市”作为“庙会”的替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1980年版《辞海》沿袭了自1936年以来几个版次的基本意思,给“庙会”这样解释:

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

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①

《中国风俗辞典》的释文类似:“庙会,亦称庙市。在寺庙内或寺庙附近的定期集市。”^②

两本颇具权威性的词书都特别强调庙会的集市贸易特征,认为庙会只是民间集市之一种。其原因何在?谢重光先生道出了个中缘由:“因为这种集市总是在寺庙中或寺庙附近举行,故称庙市;又因为它一般总是和寺庙中的法事、斋会及种种宗教、文化活动相结合,所以又称为庙会。”^③这种以偏盖全的归纳方法,与科学研究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90年代以来,庙会研究者开始突破陈说。段宝林先生以民俗学的视角,概括了庙会的综合性特征:“庙会是一种综合性的民俗,关系到宗教信仰、商业民俗、文化娱乐等诸多方面。”^④

朱越利先生注意到庙会概念的混乱现象,试图为《辞海》提供一个修改释文:

庙会是我国传统的民众节日形式之一。它是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并包括这些内容在内的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求神、娱乐、游冶、集市等活动的群众集会。被引起的活动可能只有一项,也可能有两项或多项。这种庙会可称为节日型庙会。在规定的日期内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的集市是庙市,庙市也被称为庙会。节日型庙会上的集市,也可称为庙市。应当说,节日型庙会才是民众心目中真正的庙会,从科学研究的严格意义上讲也才是名副其实的庙会。^⑤

对于这样一个界定,朱先生自己也不甚满意:“释文似乎冗长了一点。”如果仅仅是“冗长了一点”倒还好说,问题是,似乎因为作者对概念的界说原则没太在意,满足于简单

的归纳,文字尽管“冗长”,却未能提示出本质内容。

我们认为,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传统庙会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通过对其共同特点的抽象和概括,我们首先需要为庙会的本质属性做这样一个扼要说明;这是着手“庙会”界说时的学理要求。然而,庙会的共同特点是通过一系列征象表现出来的,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具有“类似”征象的“会”很多,只有在对它们进行相互比较、区别和申述的过程中,庙会的本质属性才能清楚地凸现出来。

空间的结节性

这里的结节性指的是,在庙会生活中,寺庙对其影响范围的吸附力;这一特质体现了庙会对寺庙的依托性。庙会不是一般的民间集会,它必须以庙宇为中心,没有庙宇就无所谓庙会。庙宇是庙会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国最早的祠庙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年。^⑥其祭祀情形不敢揣测。先秦时代的宗庙,泛指祭祀祖先的建筑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852页。

② 《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月,第529页。

③ 谢重光:《唐代的庙市》,《文史知识》1988年第4期。

④ 段宝林:《庙会的民俗本质》,见《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⑤ 朱越利:《何谓庙会》,见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

⑥ 辽宁文物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报告》,《文物》1986年第8期。

群,跟后世庙会之“庙”没有必然联系。^①作为庙会雏形的社祭和蜡祭,仪式地点在“社下”,据詹鄞鑫先生的研究结论,“社坛周围有矮墙,但露天而没有类似宗庙的宫室建筑”^②。设施自然简陋了些,却是庙会意义上的庙宇。自汉以后,佛教东渐,道教漫漫,各种宗教建筑趁势而起,遂有宫观、寺院及种种原始祠庙之名。这是庙会的主要物质载体。

从行为方式上看,庙会有“座会”和“迎会”之别,相应地,两者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结节性。

座会围绕祠庙而进行。在短时间内,人口爆聚在一个不大的空间,就形成了市场,是为庙市;庙市最能体现庙会的结节性。在各种不同层次的庙会中,庙市显现出3类结节点:一是市井。^③旧时北京的厂甸庙市,以吕祖阁、火神庙等为依托,在春节前后举行。庙市的所在,明代以前,还是一个地旷人稀的村落,明嘉靖以后渐显生机,清乾隆年间,由于庙会的兴起,日见繁荣。^④尽管在一个时段内,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顾客,但对于偌大的北京城来说,它只是一片市井而已。人们来到这里,不为别的,只为光顾庙会。在京城,这样的市井结点随着岁时的推移而变动不居:每月逢三在土地庙,逢四在花儿市,逢七、八在护国寺,逢九、十在隆福寺,每月初一、二十五、二十六在东岳庙,每逢初一、十五在药王庙,每年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在火神庙、厂甸、曹老公观,五月在都城隍庙,三月初一至十五日在蟠桃宫,正月十八、十九日在白云观,四月初一日在西鼎,五月初一日在南鼎,六月初一日在中鼎,春秋二季掩路会在忠佑寺,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日在南城隍庙,正月十五、二十三日在黄寺、黑寺。^⑤

二是市镇。祠庙集中于乡镇,是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庙会也就以乡镇为集聚点。乡镇跟城市不同,范围有限,四方乡民虽然冲着某一庙会而来,但实际上是以整个市镇作为活动天地的。浙江武康的上柏镇,最隆重的庙会

当称“重阳汛”。这期间,镇内外的行商坐贾及乡下的农户,竞相设摊;人们在摊位之间,穿梭不息,实有“举袂成幕,挥汗成雨”之慨,把上柏镇上的几条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河港里的船只迤迤至镇区数里之外。^⑥在这里,市镇与庙市二位一体,成为结节地域的结节点。

三是市集。有许多祠庙在“风水”清嘉的野外,平时十分清静,庙会哄聚一时。苏州西南的上方山,每年中秋后3日,来自苏州城乡、上海、无锡、常熟,远至浙江杭嘉湖等地的善男信女蜂拥而至,焚香膜拜,或求借阴债,或求子求福,或求医求寿,为时一个礼拜。^⑦这样形成的庙市,完全是墟集性质,它对周边广大区域的吸引力也仅在这个时候。

游会的结节性是通过庙、神分离的形式来体现的。在庙、神两者之间,庙是神的外壳,神是庙的核心。在两者分离的情况下,祠庙仍然是一方土地的结节点,游会通过神灵“巡游”的方式,动态表达了区域结节意义。巡游的路线叫做“踏庙”,起迄点为祠庙。城隍巡游

① 《释名·释宫室》:“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宗,与“庙”义相近,从宀、从示;宀像房子之形,示者,祭祀之义。詹鄞鑫先生认为,“庙是泛指祖先神庙”,“宗是指胞族(宗族)各支共同的祖先神庙”。(《神灵与祭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190页);沿着这条路径,后来宗庙演变为祠堂。参见鲁人:《祠堂制度考》,《盛京时报》1937年3月8日至29日。

②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第213页。

③ “市井”一词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齐语》云“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特指城市中稳定的一商业区域;汉晋以降,市井迅速膨胀,其影响驾于城邑而上,“市井”逐渐成为城市的代称。宋代以后,坊、市分离的格局被打破,“市井”内涵更为丰富。这里借用的“市井”概念,乃为其原始意义,在此特加说明。

④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4月,第49页。

⑤ 《顺天府志》,光绪二十八年重印本。见丁世良等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第12页。以下简称“民俗资料”。

⑥ 汪霖:《旧时上柏重阳庙会集市》,《德清文史资料》第4期,1993年2月。

⑦ 朱小田:《吴地庙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56页。

在全国几为通例,但达到江苏吴江“双杨会”这样规模的不多。庙会源出于震泽东 5 里的双杨庙,始于清中叶,10 年举行一次,会期半个月。农历三月初一,各圩赛船聚集双杨,凡 66 艘,载城隍及会首、道长人等,船头排列城隍半副銮驾和御牌,御牌上书“敕封护昭灵普庇广佑王”、“肃静”、“回避”等字样。三月初二日起赛,至震泽,逗留 5 天;至梅堰,逗留 3 天;至盛泽,逗留 7 天,三月十八日返回双杨,在祠庙戏台上演酬神戏 3 天。^① 通过城隍的“巡游”,双杨会沟通了几个社区之间的联系。城隍在 3 个乡镇的停留,实际上形成了庙会的多元结点。

在有些情况下,祠庙是决定庙会整体性质的。据《淮阳乡村风土记》:淮阳乡村有专门为天旱向神求雨之组织,曰雨神会。乡民知识简单,每至天久不雨,旱魃成灾时,总不免束手叹息,迫不得已,即设种种方法向神灵求雨,天一日不雨,即祈求一日,直至雨降而后已。倘雨降而田禾得其大惠者,即择于农暇特为定演梆戏一台,令各村均到会进香,以示酬答。此会即名之为“雨神会”。办理此会,亦有一定组织,普通于会中设会首数人主持其事,并另设管帐一人,以负会中一切帐目出入之责。会中所需经费,除由会首分担外,余由各村按地亩多寡分担之。会期多为三日至四日,会中活动除朝祭雨神外,近亦加入各项商业之买卖。^② 从内容上说,雨神会有戏剧演出,有祭祀酬神,有商业活动,连组织形式也颇相像,但它不是以庙宇为中心的集会,因而不能算作庙会。

容易混淆视听的是乡村社戏。寺庙戏台是旧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临时性的戏台亦复不少,特别是在乡土社会。这类戏台往往选择空旷之处,用条木席布等材料临时捆扎搭架而成。^③ 鲁迅儿时对外祖母所在的赵庄“第一盼望的”,是那儿的社戏: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时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不多时,在台

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④

其实不是庙会戏。此外,还有年规戏、春台戏、扮台戏、平安戏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类戏,是否是庙会戏性质,判断的关键是戏剧的演出场地。

主体的广泛性

在奴隶社会,最隆重的家族祭祀是宗庙祭祀。庙祭种类繁多,仪式繁琐,祭品丰盛,祭器琳琅,气势宏大。固然,上述活动是以庙宇为中心形成的盛大集会,但是,这种活动只是当时社会中极少数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家族所为,并不具有全民性,以民俗学的视角透视,不能称之为庙会。

作为奴隶主阶级主要剥削对象,构成奴隶制统治主要经济基础的社会组织是平民的宗族村社,它们是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这些宗族村社也有类似于贵族家族的祭祀活动。不过,“庶人祭于寝”,似乎还没有全村社人共同祭祖的习惯。静悄悄的祭祀是形成不了庙会的。

宗族村社的共同祭祀有两种:社祭和蜡祭。社祭的对象是土地神,它保佑村社的平安,赐给村社以丰收。社祭两次,春祈秋报。蜡祭在阴历二月举行,对象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之神。

无论社祭还是蜡祭,都关系到农事,所以是全民性的活动。孔子弟子子贡参观大蜡典礼之后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赐(子贡)未知其乐也。”孔子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

① 李廉深:《双杨庙会》,见吴江政协文史办:《吴江风情》,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年 4 月。

② 《民俗资料》中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73 页。

③ 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 150 页。

④ 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

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①

群众性不等同于规模，不能仅看人数的多少。它是有层次区别的。台湾基隆的“谢平安”规模不大，却较具群众性。平安祭由里邻，或数里联合，在当地寺庙，或结坛棚，由值年主事年初迎请，祈求平安，诸神祇集中于里邻人家，（供）参拜，并演戏酬神，谓之“谢平安”。^②

河南封丘县的祈雨赛会有两种，由于参与阶层的不同，就决定了它的集会性质。一种是由地方官僚主持的：

旧时遇旱，知县令淘濯母井，或亲诣城隍、关帝庙焚香祈祷。不应则率僚属及胥吏徒步捧香至庙岗百里使君祠，迎使君入城，在关帝庙置棚休驾，设坛致祭，朝夕焚香……以求甘霖之下降。应则具仪送神于庙，或献戏，或悬匾勒石以酬之。此邑宰祈雨之大概也。^③

另一种是广大民众参与的：

若民庶，多搬关帝神像于庙外，朝夕焚香，必落雨后方入庙致奠，或金神献戏。所奇者，有置鞦韆迁关帝驾于其中，设坛喊佛，发髻跪褥，燃炮鸣鼓，以神附人体，曰（乘）马匹，执大刀，二人扶之往玉皇庙中领旨取水，定下雨时日。应则游街夺官，且约邻村捐资以演戏剧。远近妇女供旗伞，进香塔。^④

在这里，官、民活动是分离的。

跟封丘的情况不同，在湖北房县，在立春前的“办春”庙会活动中，官民之间浑然一起，一派“官民同乐”的情景：

先一日，诣老关庙祭土牛，句芒神，昇入城，犁把叉帚前后拥导，十二亭故事鼓乐随之。市人争以米、麦、谷、豆向土牛抛洒，视其头尾四蹄青、黄、赤、白、黑，以为水旱、丰歉之兆。小儿纷纷穿土牛腹下，以为出痘稀，且弭疾也。又，视芒神衣履着否，以卜一岁苦乐曰：“芒忙人不忙，芒不忙人忙。”至县门前，各官随其后，皆盛饰卤簿，前列花胜数竿，市人争相攀摘，曰“抢春”。出东景春门，文昌阁后设彩棚，各官祭芒神，就席饮春酒；农夫击社鼓，鸣大锣，唱秧歌数阙。昇芒神、土牛入县署前，十二亭故事穿街绕巷，曰“迎

春”^⑤。

这样的庙会，因为官僚阶层的参加，增强了其广泛性。

从动力机制上说，主体广泛性的实现，源于参与者的客观需要。传统中国社会，闲暇生活贫乏，整个社会性的娱乐，主要的就是庙会。进入近代，乡村社会的农产品日趋商品化，由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国内市场的发达，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主要渠道，自然只能依赖作为产地市场的集市和庙会。^⑥ 所有这些，在在都显示出庙会与平民百姓的休戚关联。河北张北的地方志修纂者精辟地分析道：

县城夏历六月二十四日庙会，对于社会、家庭、经济，有种种深意存焉。此会为定期，历有年所，远近皆知，为一成不变之习惯。此时将届秋令，收获禾稼一切农具购买困难，借此会期，内地商贩运来出售，远近农民均来争购。此便于农民者，一也。各乡农民该外、外该债务，结帐还债，远隔一方，殊形不易，大多数规定会期彼此接头，清结一切，无异他处标期。此便于整理经济者，二也。农民嫁娶，对于首饰、衣服、妆奁等件，购买困难，借此会期，领女携男，亲自到会购买，自由挑拣，心满意足。此便于婚嫁事者，三也。母女，姊妹出嫁后，晤面谈心实属匪易，况系农家，终年劳碌，省亲看女，探亲访友，既无暇晷，亦无机会，借此会期，不约而同，均可会面，各叙衷曲。此便于会亲者，四也。至口内商贩，届时争先恐后，云集会场，买卖牲畜，而各乡农民所畜牛、马、猪、羊、鸡、蛋等项，均可出售。借此活动生活消费者，五也。以上各种情形，足征此会

① 《礼记·杂记下》。

② 《基隆县志》1954~1959年铅印本。见《民俗资料》华东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595页。

③④ 《封丘县续志》，1937年铅印本。见《民俗资料》中南卷，第60页。

⑤ 《房县志》，同治四年刻本。见《民俗资料》中南卷，第453页。

⑥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于人民关系匪浅，未可淡然视之也。^①

这样的关联，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渐为松动。本世纪30年代以后，在河北新河县，人们发现：

近年以来，庙会远不如昔日之盛，盖民智日开，迷信风衰，且交通日便，都市勃兴，娱乐、交易多不专恃乎庙会也。^②

内容的复合性

庙会内容的复合性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以内涵而言，其复合性表现为，庙会内容十分丰富。庙会常常集祭祀、商业和娱乐于一体，杂烩纷呈。仅以庙台戏来说，随地区不同便有相异的戏曲唱腔。在河北阳原县的庙会上，“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梆子（有时亦演弦子腔，略近昆曲，但百不一次），与蒲陕调大同而小异……清末，张垣坤伶亦有来者，偶演秦腔（即京梆子），声悲音锐，未若晋调之幽雅，县人未甚欢迎也”^③。河南获嘉的庙会戏剧，除梆子戏外，“二架弦”较为常见。二架弦，即安阳腔。其唱也，重用胡琴，安阳最盛。山西庙会的演出剧种有山西梆子、北路梆子、蒲剧、豫剧、秦腔折子戏、上党梆子等，其唱腔非常适合当地百姓的口味。庙会戏曲的巨大差异，让一位从上海来到兰州的赶会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五泉寺“大门内的戏台上演着秦腔，我们南方人很难听懂”^④。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的差别，庙台戏亦显出很大差异。乡村庙会，调近俚俗，散发出醇浓的乡土气息。

如果我们聚焦于单一的行业庙会，其丰富的内涵更加明显。以山西新绛为例，因为县城手工业发达，具有行业特色的庙会达数十种之多。各种庙会发起行业不同，经费来源复杂，奉祀对象不一，参与层面有异，商业偏向明显，以六月六的“赛皮货”规模最大。

以外延而论，其复合性表现为，庙会型式十分庞杂。

夏日炎炎，旱象毕呈，乡民心急如焚，乃

有“祈雨会”，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关帝、龙王、城隍、雷公身上。这时的人们是虔诚的：

一条长长的队伍，前面是乐队，紧挨着的手持香盘，接着是僧道、端公，最后是求雨的人们，头箍柳条圈，袒胸，露臂，赤脚，浩浩荡荡向龙王庙进发。到得庙里，领队人在神像前焚香燃烛，人们在烈日之下依次跪叩，默默祈祷。在端公狗皮鼓和铜锣的伴奏下，僧人敲着木鱼，唱起求雨歌：“锣鼓喧天进庙堂，烧香磕头拜龙王。求您行令把雨下，救救地里的早庄稼……”^⑤

在祈雨会中，如果说有什么娱乐，那是在天降甘霖之后的事，为的是酬神、娱神，娱人的成分较少；商业活动是根本不会有的。这是性质单一的祈祷型庙会。

性质单一的娱乐型庙会更多，特别是对于一些信仰对象宽泛的庙会来说。辽宁盖平城东的“八蜡庙会”，本为早蝗而起，但在这里，完全看不到有如江南地区“猛将会”的酬神活动：

每逢会期，演戏五天，人士流览者众；且此庙距城较近，正值溽暑天气，城中人民欲到乡野间散心，故文人墨客、商贾、少年往来如织，恣意游观俯仰，别有兴趣。庙山居清河铁塔之侧，水色山光映带左右，恍如一幅天然图画。城中酒家集此开坛供客，虽非文君当炉、相如佣保，而酒帘飘处，不亚杏花村店风味。搏战之声，时悠扬于绿阴夕阳以外，非特雅事，亦佳话也^⑥。

称之为“避暑会”亦未尝不可，会中的商业行为，融为旅游活动的一部分。

河北安国的祁州庙会，驰名全国，相沿500余年。这里交通不便，也不是药材产地，

① 《张北县志》，1935年铅印本。见《民俗资料》华北卷，第165~166页。

② 《新河县志》，1929年铅印本。见《民俗资料》华北卷，第516页。

③ 《阳原县志》1935年铅印本。见《民俗资料》华北卷，第186页。

④ 钱菊林：《庙会杂景》，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9月。

⑤ 葛炎章：《求雨》，《漆园古今》第10辑。此为安徽蒙城县文史资料。

⑥ 《盖平县志》1930年铅印本。见《民俗资料》东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但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指为“药王”诞生地，立庙祭祀。庙会期间，虽则也有摆供、顶礼、献戏之类的活动，不过那只是点缀而已，充斥其间的是辐辏嘈杂，是浓烈药味，是锱铢计较。^①这是道地的庙市，因庙而起的药材集散市场。

一般而言，土地会的内容相对单调一些。广东普宁的情况可见一斑：春社日，乡民具香帛、酒饌相率祀其乡之土神，祀毕，聚饮于神侧，称之为“做社”^②。

庙会内容的复合性还表现在，它是判别庙会性质的综合指示器。1936年5月1日，有人目睹，郑州南关的“眼光庙早已倒塌了，原有的庙址已被妇女职业学校占用。每逢会期，只好临时搭个席棚，供奉眼光爷”^③。但总体衡量，丝毫不影响它作为“庙会”的形象。

一些特殊的群众性祭祀和娱乐活动，比如蒙古族的“祭敖包”，能获得庙会的性质，也是综合考察的结果。敖包，一作鄂博，在蒙古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土、草等堆积而成，插上树枝，两侧各有3根旗杆，上悬横条狼牙经旗，周围摆放垫石。^④在这里的夏日：

每逢神佛之祈祷节，尤多念经、赛神、神舞诸会，举行仪式，以求降福消灾……其于致祭山

头鄂博时，全族民众莫不华服乘马，男女并肩，向鄂博出发。至，由以羔羊剖腹，去腑脏，覆于燃烧之藏香、柏叶上，乃扬洒鲜血、清酒，缚挂哈达及隆会达布（布绘鹿马等物，并印度咒文）及咒文胛骨后，赴会者咸左绕鄂博数匝，并高呼“哈会家牢”而散。^⑤

从原始意义上理解，“鄂博”是其空间依托，又具有庙会的其他特征，称其为庙会还差强人意。

【收稿日期】1999—4—12

【作者简介】小田(1963—)，男，江苏苏州人，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 殷 铭】

- ① 刘华国、许子素：《祁州庙会》，《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
- ② 《普宁县志》，乾隆十年刻本。见《民俗资料》中南卷，第787页。
- ③ 石珀：《郑州的眼光庙会》，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9月。
- ④ 林新乃编：《中华风俗大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912页。
- ⑤ 《青海》，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见《民俗资料》西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93页。